

# 建国初期乡村社会的变迁

## ——以农民教育的效果为中心

□李飞龙 [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 北京 100091]

**[摘要]**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广大乡村的农民进行了规模宏大、形式多样的思想文化教育和业余文化教育,使得乡村的政治、经济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与之相适应的乡村社会也呈现出崭新的面貌,主要表现在农民职业的分化、心理的转变、参政议政热情的高涨、社会风气的变化等,这些改变有利于国家政权的施政,为以后历次政治运动的展开提供了条件。

**[关键词]** 乡村; 职业; 政治; 心理; 风气

**[中图分类号]** C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105(2009)06-0058-05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广大乡村的农民进行了规模宏大、形式多样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业余文化教育,使得乡村的政治、经济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与之相适应的乡村社会也呈现出崭新的面貌。迄今,学术界对建国初期乡村社会变迁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对乡村社会变迁的总体状况还缺乏系统梳理,本文拟从中国共产党对广大乡村的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业余文化教育产生的影响出发,选取乡村社会的职业分化、政治参与、心理转变、风气变化四个方面作为研究对象,对建国初期乡村社会的变化进行探讨。

### 一、农民的职业分化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对乡村社会进行业余文化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整体素质,促进了农村社会的进步,也使得农村社会的分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文化层次的提高加速了农村非农化的进程。在当时的农村中,非农化的职业分化主要是一部分农民转为了工人,还有一部分转为了干部。当然这种流动只是很少的一部分群体,大部分农民还是在农村从事基本的田间耕作。

农民转为工人在近代历史上一直存在,在1958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之前,农村人口转变成为城镇人口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当然

要想在城镇站住脚,并不是自己跑到城里住下就能解决的,这需要一定的谋生手段,即要成为具有科学文化知识的脑力劳动者或者具有熟练手艺的手工业者。建国初期,一部分农民通过业余时间学习文化知识,为其在城镇中找到工作,或者由国家直接分配在工厂里做工创造了条件。如北京石景山区的刘玉田,男,当时27岁,参加识字班之前,斗大的字不识一个,1952年参加学习,高级班毕业后担任了农业合作社副主任。后来经过他的劝说,有个年轻人也参加了扫盲班的学习,毕业后升入初中,后来做了工厂的工人<sup>[1]</sup>。

“学而优则仕”,文化程度高的人有更多的机会向社会上层流动。建国初期,在乡村社会,学习成绩优秀者极有可能成为乡、村两级的农村基层干部,当时部分乡级干部,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合作化时期改为合作社主任、副主任)、会计等村级组织的主要领导干部,几乎都是建国初期的业余文化教育培养出来的,同时还有妇联主任、民兵连长、治保主任、调解主任、小组长等,也同样来源于此,可以说农民业余文化教育培养出的干部占据着农村管理者的绝大部分。例如:北京郊区石景山区的姬风琴,女,当时20多岁,1951年参加了政府组织的扫盲班,经过三年的学习,高级班毕业后在农业合作社里做会计工作<sup>[1]</sup>。

当时,一般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农民都转为干

[收稿日期] 2008-12-10

[作者简介] 李飞龙(1981-)男,中央党校中共党史部博士研究生。

部和工人,至少也担任了村级的会计、出纳员等职务,他们较一般的农民而言,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正在于建国初期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普遍很低,一般高小的文化水平在一个村里都很少,所以村干部一般由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农民担任。

## 二、农民的政治参与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专制历史的国家,农民一直是一个被排除在政治权利之外的群体,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对广大农民群众进行了形式多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改变了长期以来农民对政治比较冷漠的心理,提高了广大农民参政议政的热情,实现了广泛的社会动员,即:……引导、组织和推动全体社会成员向现代人转变的变迁……;引导、组织和推动全体社会成员(反现代化社会成员除外),将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sup>[2]</sup>。

第一,积极参政议政、出谋划策。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的教育活动,增进了广大农民对国家制度和方针政策了解,从而为农民的出谋划策提供了前提。1949年在北京召开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中,郊区就有30多名农民代表参加,农民代表在会上提出的许多意见,受到了政府的重视与合理的采纳,并尽可能的付诸实施。当年秋天,为了解决种麦问题,政府就贷给郊区农民麦种23万斤,交换麦种40万斤,贷肥10万斤<sup>[3]</sup>。在向国家和地方政策提出意见的同时,广大农民更是积极参加了基础政权的管理。据湖南省统计,在土地改革中新建的13274个乡中,9443个乡的乡长是翻身农民,担任乡农民协会主席、团支书、民兵队长、妇女会主任工作的翻身农民达47215人,其比例高达95%<sup>[4]</sup>。

第二,积极参加共产党、青年团和农会。经过宣传教育,农村涌现出大批农民积极分子,1951年仅华东地区就有30余万农民积极分子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sup>[5]</sup>。这些农民的加入,壮大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其中表现优异者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也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社会中的影响。1954年11月,中央组织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工作会议,会前,全国22万个乡中已有17万个乡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农村党员近400万人,占农村人口的0.8%。随着全国的解放,封建、反动的保甲制度被

彻底废除,农民协会的力量日益发展壮大,在农民协会的基础上,乡人民政府逐步建立起来。农民协会培养出的大批干部,是各地新兴农村政权干部的源泉,是建立新型乡级人民政权的基础。较高的文化知识和过硬的思想政治素养是巩固和发展基层政权的基础,而稳定的农村基层政权又进一步巩固了农村人民民主专政,有力地镇压了农村中土匪特务的活动。1951年,仅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四大行政区农民协会会员就有8800余万人,其中妇女约占30%左右<sup>[5]</sup>。1952年苏北有农民协会会员7194932人,平均占总人口的34%,如泗阳县新合村农会会员达到50%多,妇女表现更为积极,全区共有300余万妇女参加了农会组织,占妇女人口的30%左右<sup>[6]</sup>。这些都是开展农民教育的结果。

第三,踊跃参加选举,全国形成了普选高潮。普选是一个国家民主的标志,也是广大群众参政议政的重要形式。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才有了真正的民主。经过广泛的宣传教育,时至1951年,全国94%以上的县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解决了各阶层人民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使政府的政策法规得以及时传达到农村<sup>[7]</sup>。1953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2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同年4月,颁布了《中央选举委员会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随后包括广大农村在内的基层选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1954年4月,有56000多个基层单位,共约1亿4千多万人口的中南地区完成了基层选举工作,建立了完备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基层政权组织<sup>[8]</sup>。在广大的农村中,经过普选产生的基层政权组织,大都通过村人民代表大会向农民宣传了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有力地推动了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如吉林省永吉县红旗村,普选后由于政府工作的改进与党的积极领导,广大群众认识了社会主义的灿烂远景和互助合作的优越性,全村在普选后新建立了6个农业生产合作社,1954年全村组织起来的农户预计占到全村总户数的89%<sup>[9]</sup>。经过普选,各地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简化了组织,改进了工作方法,工作制度也逐渐健全,使基层政权组织的工作效能有了显著提高。江西省铜鼓县江头乡原来有各种经常性和临时性的委员会11个,基层干部兼职过多,无暇分身,许多具体工作分工又不明确,普选后,江头乡把原来的11个委员会合并成6个委员会,干部明确分工,减少了兼职,这样完成工作任务又快又好,使

这个乡很快成为工作先进乡<sup>[8]</sup>。

### 三、农民心理的变化

影响中国农民传统社会心理的形成和发展有以下四种因素:小农业的生产方式、宗法血缘的社群结构、以封建正统文化为支柱的社会规范和小生产者受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地位<sup>[10]</sup>。经过土地改革和对农民教育,这四种因素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农民的心理方面。

第一,从“知足常乐”到“发家求富”。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土地改革及一系列政治运动,实现了土地关系、阶级关系的剧变,贫、雇农翻身成了农村的权威群体,地位得到上升,但农村中普遍存在的“以穷为荣”,“以富为耻”<sup>[11]</sup>和由于长期封闭形成的“知足常乐”思想,严重地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此党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和业余文化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民这种“以富为耻”的心理。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农民实现从“知足常乐”到“发家求富”的意识转变是一个复杂的反复过程,如:河北省民校在响应政府打井的号召时,遇到农民有“怕冒尖”、怕“增加负担”等思想顾虑,民校针对性地讲解有关发家生产的国家政策,说明打井是为了增加产量的正确意见。通过细心的说明教育,打井工作得以很好地完成<sup>[12]</sup>。

第二,从“胆小怕事”到“积极参与”。“胆小怕事”是长期以来保守思想的集中反映,广大农民受长期封建思想的影响而“胆小怕事”,对政治缺乏热情,经过开展农民教育以后,这种思想有所改变,他们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活动开始了“积极参与”。1949年河南在反恶霸减租运动中,开始改造乡政权,“老实农民还多不敢出头办事。他们认为自己从来是被管的,不会办,怕办错。”经过国家积极的政治宣传和组织农民学习文化知识,农民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当他们看见一部分旧的乡镇人员贪污浪费,不能为人民和国家办事时,觉得自己可以更好地把工作做好,所以他们站出来为广大人民工作<sup>[13]</sup>。

第三,从“家庭本位”到“阶级核心”。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以家庭为本位,是以婚姻和血缘关系为交往的纽带,阶级意识淡薄,尤其在宗族势力很强的地区,农民对同宗同姓的地主缺乏斗争意识,对二流子反而痛恨,贫、雇、中农间闹小纠纷,诉苦

对象也多非地主<sup>[14]</sup>。经过土地改革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增加国家(共产党)的直接影响,扫除基于财产和地方积累起来的权利之上的权威,把对血缘的忠诚转向对新发展起来的法人团体即集体的忠诚,同时又抑制正在以现代形式露头的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sup>[15]</sup>。农民开始坚信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增强了阶级意识、弱化了家族意识,从而为国家权力向农村基层渗透提供了保障,“庄稼人向着庄稼人”,“天下农民是一家”,都说明了阶级意识已经取代了农民的家族意识。

通过多样形式的政治教育,农民的心理发生了很大变化,小生产者自私心理得到较大的克服。从思想上改造农民,尤其是注意提高中农的社会主义觉悟,增强了农民的集体主义责任感,从而为国家政策的推行和农民现代化意识的培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 四、社会风气的变化

农民经过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学习,使农村的社会风气有了很大的改变,主要有:妇女社会地位得到提高,男女平等观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确立;婚姻制度由父母包办开始向自主婚姻转变,自由恋爱成为主流;赌博、懒惰现象有所改变,教育改造了一大批二流子。可以说这段时期农村社会向着健康向上的良好发展轨道迈进。

第一,妇女社会地位得以提高,男女平等观得以确立。建国后,平等观念得到了广泛传播,国家通过各种媒体和基层工作,加大了对男女平等观的宣传力度,通过对农民开展思想政治和业余文化的教育和学习,妇女要求平等观念和知识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一方面,她们积极参加工作,提高经济地位。如1950年新疆解放后,广大农村妇女在受到教育以后开始参加生产,喀什、迪化、阿克苏、伊犁、焉耆等六专区及迪化市,即有49万余妇女参加了修渠、开荒、秋收等生产运动<sup>[16]</sup>。另一方面,积极参与政,提高政治地位。妇女参政的阻力是很大的,尤其是农民妇女。很大一部分农民认为,“妇女管家事能行,管国事不行,就是选上也得掉下来,不顶事”。“妇女做妇联会工作还行,当乡长、区长,领导全面工作就不行,哪有妇女领导男人的”<sup>[17]</sup>。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教育之后,状况有所好转。1949年,在晋绥土地改革以后,很多妇女占据着重要的领导岗位,被选举到区以上政府机关中工作的

女干部就有257人,连原有者共有615人。晋绥土地改革以前县级女干部只有26人,1949年则有132人。一般村人民代表会议中女代表约占15%<sup>[18]</sup>。在1954年的基层普选中,妇女表现最为积极,安徽省金寨县麻埠区月牙乡妇女委员刘世茹说:“妇女也能参加选举当家作主人,这是血肉换来的政治权利,我一定要领导姊妹们积极参加普选”。该乡70多岁的谢老奶奶,在普选中每次开会都带着四个媳妇到场<sup>[19]</sup>,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第二,婚姻习俗发生变化。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务院于1950年6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废除包办婚姻、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结婚须男女双方本人完全同意,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制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sup>[20]</sup>。《婚姻法》以法律的形式排除了封建婚姻制度,解除了父母包办婚姻的权利,并同时在农村对广大农民加强教育,树立正确的婚姻观,使农村婚姻制度由父母包办开始向自主婚姻转变,包办婚姻比例下降,介绍型婚姻开始占有一定比例,自由恋爱有较大的发展趋势。阎云翔在他的论著《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和亲密关系1949—1999》中对下岫村村民择偶类型作了如下分析:

表1 黑龙江省下岫村村民择偶类型

时期	包办婚姻		介绍型婚姻		自由恋爱		个案总计
	%	N	%	N	%	N	
1949~1959	73%	28	24%	9	3%	1	38

资料来源:阎云翔著,龚小夏译:《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和亲密关系1949~1999》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55页。

从这个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出包办婚姻虽然占有较大比例,但是可以看到介绍型婚姻和自由恋爱已逐渐发展起来。

第三,赌博、懒惰现象得到改变。解放前的农村社会长期存在着十分严重的赌博、游荡现象,每到冬天农闲时,各村都有部分农民开始赌博、游荡<sup>[21]</sup>;解放以后,通过组织农民参加冬学和民校学习,一方面使他们把空闲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学习文化知识,赌博的机会大大减少,另一方面在学习了文化知识以后,他们对赌博、懒惰现象也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华东区寿昌县卜家蓬乡十八村是历来出名

的赌窟,外村人都来村中聚赌,经过教育以后,这种现象得到了改变。有个雇工叫周炳荣,受教育前拿到工资没出地主家门就已输光了,受到教育以后,自己种田还积余20多担谷;团结乡有个有名的懒汉黄金根,受教育前每天人家烧午饭他才起床,受到教育以后,已能很早起来劳动了。“劳动光荣、懒汉可耻”已成为农村社会新的道德标准。

第四,教育改造了一大批二流子。二流子是旧社会的产物,这些人一部分来自于剥削阶级,他们过惯了寄生生活,鄙视劳动、贪污腐化、投机取巧、欺骗讹诈;一部分来自于下层社会,他们被剥夺了生存条件而流离失所,无衣无食,为了生存,或以军阀或以土匪为依靠,欺善助恶,为害乡里。他们既是旧社会的牺牲品,又是新社会的不安定隐患。对他们进行教育,不但稳定了社会秩序,而且对创造良好的农村社会风气有着重要的作用。华东区寿昌县下余村对十多个二流子进行了思想教育,改变了他们长期形成的不良习气,促使他们走向了生产和工作及学习。萧山参加“一贯道”的农民经过教育以后,觉悟到受骗了,并纷纷自动脱道;南陵县2000个刀徒经过教育以后,自觉退出了“刀会”<sup>[22]</sup>。新疆在1950年仅莎车区就教育并组织了二流子、流氓等6193人参加了劳动<sup>[6]</sup>。二流子的转变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一方面,增加了国家建设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又消除了社会不稳定因素,正如毛泽东所说,二流子的改造,不但增加了劳动力,而且消灭了坏人坏事,取得了人民的拥护,巩固了社会的安定。

建国初期乡村社会的巨大变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农民教育的成功,做到了国民党政府想做没有做到的事,改变了过去乡绅或者豪强控制农村的局面,在广大农村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种崭新的新型乡村社会模式。这种改变影响是深远的,它有利于国家的政策、方针在基层的推行。

## 参考文献

- [1] 浅井加叶子. 1949~1960年中国成人扫盲教育的历史回顾[J]. 当代中国史研究, 1997(2): 109-120.
- [2] 张静如.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现代化[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1: 5.
- [3] 人民日报专访. 京郊六十四万农民拥护人民政协三大文件, 记北京郊区农会筹备会主任柴泽民谈话[N]. 人民日报, 1949-10-9(4).

- [4] 徐国普.建国初期农村权利结构的特征及其影响[J].求实(南昌), 2001, (1): 51-53.
- [5]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央档案馆编.三年来土地改革运动的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村经济体制卷1949—1952)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
- [6]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央档案馆编. 苏北行政区二年来土地改革运动基本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农村经济体制卷1949~1952)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 423-424.
- [7] 南开大学历史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1958: 71.
- [8] 新华社. 中南五万多个基层单位完成普选[N].人民日报,1954-4-20(1).
- [9] 人民日报. 东北近十分之九人口的地区完成普选.新选出的基层政权正积极贯彻国家总路线 [N].人民日报,1954-2-20(3).
- [10] 程献.晚清乡土意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13.
- [11] 杨娜.一九四九至一九五六年的中国农民阶级分化[J].中共党史研究,2005, (2): 35-43.
- [12] 不详. 老区农民坚持民校学习[J].新华月报, 1950, (9):1139.
- [13] 新华社. 中南区农村基层政权已建立,废除旧保甲制度,纠正某些干部不纯作风,为秋征及土改打下基础[N].人民日报,1950-10-19(2).
- [14] 葛剑雄.谭其骥日记[M].上海:文汇出版社,1998: 3.
- [15] 吉尔伯特·罗兹曼. 中国的现代化[M].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研究现代化课题组”, 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350.
- [16] 胡中. 第一个充满欢笑的新年,记新疆农村一年来的新变化[N].人民日报,1951-1-9(1).
- [17] 李屹阳. 动员妇女群众积极参加普选运动[N].人民日报,1953-6-9(3).
- [18] 新华社. 晋绥广大劳动妇女积极生产支前参政,表现了新式妇女英雄气概[N].人民日报,1949-3-9(1).
- [19] 不详. 金寨麻埠区老根据地人民积极参加普选运动[N].人民日报,1954-3-10(3).
-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172-177.
- [21] .特里尔. 毛泽东传[M]. 刘路新, 高庆国译.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279.
- [22] 不详. 华东2万余乡土地改革后,农村一片新气象[N].人民日报,1951-3-13(2).

## Rural Community Vicissitude in Early Years of the New Nation

LI Fei-long

(Party School of the Contral Committee of CPC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aunched various educations in large scope for peasants' ideology and literacy.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ircumstance had changed a lot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new nation. It presents the new appearance in the rural community, which is mainly displayed in the farmers' psychology transformation, the professional differentiation, the enthusiasm in participating government or deliberation over governmental affairs and the change of the society ethos. These Changes are beneficial for state power implementation and they provide conditions for political movements.

**Key words** country; occupation; politics; psychology; ethos

编辑 戴鲜宁